



中央民族大学“985”、“211”工程项目成果
青年学者论丛

GONGMIN YU XIANDAIXING ZHENGZHI
YI LUSUO WEI ZHONGXIN DE KAOCHA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

以卢梭为中心的考察

袁贺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985”、“211”工程
青年学者论丛

GONGMIN YU XIANDAI XING ZHENGZHI
YI LUSUO WEI ZHONGXIN DE KAOCHA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

以卢梭为中心的考察

袁贺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以卢梭为中心的考察/袁贺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 - 7 - 5660 - 0317 - 1

I. ①公… II. ①袁… III. ①公民学—研究 IV. ①B82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9443 号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以卢梭为中心的考察

著 者 袁 贺

责任编辑 杨爱新

封面设计 范 凡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317 - 1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	-----

上部：“舆论的气候”与卢梭研究

第一章 卢梭研究的方法论讨论及本书的考察框架	(7)
第一节 研究政治思想家的方法论思考	(7)
一、研究政治思想家的意义	(7)
二、研究政治思想家应该注意的基本问题	(10)
第二节 本书的选题进路	(12)
第三节 卢梭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脉络	(14)
第四节 本考察的方法论补充说明、难点及框架安排	(29)
一、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补充说明	(29)
二、本研究的难点	(29)
第二章 卢梭时代之前“舆论的气候”之发育	
——对于公民和政治秩序关系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32)
第一节 古典政治秩序思想的演生	(34)
一、古希腊的政治秩序思想	(34)
二、古罗马的政治秩序思想	(49)
第二节 现代政治秩序的演生	(52)
第三节 现代政治秩序思想的演进：理性时代的来临	(69)
第三章 卢梭时代的“舆论气候”	(92)
第一节 卢梭时代法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92)
第二节 卢梭时代法国的社会风尚	(97)

下部：卢梭之公民观思想的论说逻辑

第四章 公民问题是卢梭关心的核心问题	(112)
第一节 研究者和评论家眼中的多面卢梭	(112)
第二节 卢梭自己的声音	(115)

第五章 反思并重写人的历史:卢梭探讨公民问题的入口	(120)
第一节 反思道德风尚的败坏:公民主题的呈现	(120)
第二节 公民出现的前提:人与社会的历史构设	(125)
一、卢梭政治思想的纲领:人的自然状态	(125)
二、社会—政治人的诞生	(129)
第六章 共和国:公民政治生活的合法秩序	(138)
第一节 公意与社会契约	(138)
第二节 公民共和国与法治	(144)
第七章 从道德的自由人到道德的政治人:公民的培育	(159)
第一节 道德自由人的培育	(159)
第二节 道德政治人的养成	(171)
第八章 公民与正义秩序的生成	(189)
第一节 合格公民与伦理共同体	(190)
第二节 合格公民对社会的正义改造	(200)
第九章 卢梭与现代性政治的困局	(206)
第一节 现代性的内涵	(206)
第二节 卢梭抗拒现代性政治的尝试	(209)
结 语	(213)
附录一:征引与参考文献	(217)
附录二:卢梭的中国面孔	
——中国卢梭研究百年述评	(227)
后 记	(240)

绪 论

本书主要是以卢梭为考察对象，思考现代性和公民问题的关系。卢梭的公民观和晚清中国的新民说风潮是引起笔者思考这个问题的契机。

笔者是从阅读卢梭的作品着手的。当比较系统地读过卢梭的著作之后，笔者发现卢梭的思想是具有很强的一贯性的。但当时令我疑惑的是，为什么卢梭在《忏悔录》里反复申说他的思想是具有连续性的，难道当时就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带着这个疑惑去找资料，发现解读卢梭政治思想的学者之间的歧见不是在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由是，笔者产生了把自己的见解阐发出来的愿望。

我的看法简单地说，就是认为解读卢梭思想的关键在于卢梭的公民观。笔者的专业方向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按要求应当作和中国有关的课题，笔者起初准备在阐释完卢梭的公民观以后，接着作卢梭公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经过资料爬梳，笔者认为，卢梭在近代中国的确是一个有影响的西方思想家，但他的公民观才是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这个观点在目前的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仍然是有待阐释的。卢梭在晚清中国是以革命思想家的形象出现并被传播的，夏良才等先生对此作了详尽的梳理。但这似乎只是当时政治思想现象的一个方面。如果从革命思潮推及更广泛的社会思潮，比如通过《大公报》，可以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新民说风潮。这和卢梭有什么关系吗？Leo Strauss学派把卢梭置于现代性背景下来解读的方式极大地启发了笔者思考方向的转换。卢梭公民思想的出现和他抗拒现代性的企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西方第一个对现代性的后果进行深刻反思的思想家。他抗拒的方式就是造就新人、改造社会；反观近代中国的新民说，恰是在西方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深入的背景下，中国思想界的先行者生发出强烈的危机意识时出现的。卢梭和晚清中国思想界提出问题的背景的交叉之处不言而喻。由此，探讨现代性的普遍意义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意义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思考路向。

然而要讨论这个问题，如何阐释卢梭就成为笔者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由于对卢梭思想的属性争议颇多，他主要的思想是不是集中在政治领域，学术界都有争议，怎样定位他的政治思想争议也很大；另外，卢梭的政治思想是不是有一个系统的结构，这是一个争议更大的问题。而笔者认为，不仅从根本上来说卢梭是一个政治思想家，而且他的公民观是统系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公民观是卢梭思考政治秩序

的主要内容。这会不会只是人言人殊的一人之说？如果只是做成这个样子，那它的价值不大。

笔者根据 Karl Mannheim 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学）思路，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较为客观的社会背景下予以考察：在纵向上对卢梭以前关于政治秩序的思考的主要脉络予以交代；接着，考察古典政治秩序的崩溃和现代政治秩序的兴起；然后考察新政治——社会秩序的变迁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反映。通过这种考察，笔者认为公民问题是现代性兴起以后，思考政治秩序的现代主要思想家共有的核心论题，卢梭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员，在历史背景上印证了笔者判断卢梭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公民观是合适的。

笔者拟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卢梭是不是政治思想家，他的自传所反映的内容是否可靠。如果笔者要证实卢梭的思想是集中在一定的论域内的，他不是一个散漫的思想者，那么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借助经典作家的作品，对卢梭生活时代的法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法国（一定程度上包括欧洲）的社会风尚、当时思想界活动的场所和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从多个角度证实了卢梭的自传是可靠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况以及他被他的朋友和社会所孤立的处境的真实性，它们是可以被当成可信的史料予以采用的。

由于上述两个问题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它是相对客观的，对它们进行的梳理也印证了笔者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想法。不仅如此，它还支持了笔者提出另一个解读卢梭思想的观点：必须重视卢梭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讲，卢梭的小说是比其他的几部经典作品——通常人们认为它们才是反映卢梭学术思想的著作——更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笔者按照卢梭主要著作的写作次序，更主要的是按照它们的主题所反映出的思想系统性，对它们加以评注性释读，离析开科学理性思想和生活所固有的矛盾——生活不是科学的产物，但人们总会按照理性的模式去解读人类文明史——与卢梭自己的论证逻辑的关系，论证了笔者解读的卢梭的主要观点是合乎卢梭的原意的。

完成了这些之后，笔者讨论了卢梭和现代性的关系。笔者发现，施特劳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卢梭的评判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本书只是简略地结合他们学派的观点和笔者对卢梭思想的解读对卢梭的这一特征予以简略的评论。之所以如此，乃因为论题的目标所限，本书的核心努力目标乃是先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论证出卢梭的核心论题为何，确定卢梭思想研究的主脉，从而为卢梭政治思想研究的重心画出一个阈限。

最后笔者对本书的章节安排和主要内容做一点介绍。本书按论题的集中程度共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的方法论及介绍卢梭时代的舆论气候，第二部分为对卢梭论题重心的系统论证。

第一部分乃是笔者考察卢梭致思主脉的基础。通过对中外卢梭政治思想/哲学研究主要路径的考察，笔者发现这些研究基本上很少关注这个问题。西谚有云：一

个人像他的时代甚于像其父亲。研究者如果忽视“时代的舆论气候”对一个思想家的影响，而只重视对其作品的考察，很容易出现对思想家议题重心的侧滑，呈现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现象。毫无疑问，既有的卢梭研究呈现出了这种状况。本书考察的一个基本雄心就是试图终结这种过于分散的纷争。这一目标之所以可能实现，乃是因为卢梭和许多其他重要的思想家有不同之处，即他有三部自传体作品。在笔者过目的既往研究中，多数有分量的研究都很重视这些自传体作品的内容，但几乎没有发现有人对这些自传的可靠性进行勘察。笔者认为本书核心贡献即在于留意到这个缺憾，并对此进行了有相当新意的考察。既有的大部分思想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的思想史研究，惯于采用宏大叙事，以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之类的大写意手法介绍所考察思想家的时代，试图以此确定思想家的致思范围。笔者认为这样的宏大叙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宏大叙事远远不能框定特定思想家个体的特殊感受。本书借助时代的“舆论的气候”这个概念，引入相关时代的家庭—社会风尚史考察，这种考察相对更为微观，因为它深入到家庭和微观社会关系领域，理当与理解思想家个体的特殊性更为贴合。卢梭的自传体作品特别是其《忏悔录》有诸多的社会风尚的描述，而这些风尚是否真实，显然涉及对卢梭“忏悔”之坦诚性的接受与否。笔者注意到，既往对卢梭政治思想进行研究的诸多学者对卢梭的争议往往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对这个问题的信任/质疑又往往决定了学者们对卢梭思想处理的路向。有意思的是，在笔者看到的既有研究中，却恰恰缺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本书对卢梭的考察首先试图解决的问题即在此：通过对卢梭时代的“舆论的气候”的考察，证实卢梭所描述的其时代的风尚的真实性，终结“信任/质疑”卢梭的主观性，从而为阐释卢梭思想的主脉提供一个更为客观可靠的社会根基。这是本书对类似思想家研究的一个方法论上的创新。

本书的第二部分则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着重对卢梭的著作进行重新考察，从而揭示出对现代新“公民”问题的关注，将能体现出卢梭政治思想致思体系的一贯性。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努力。本书写作的具体框架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本书写作的方法论和学术史爬梳，侧重对卢梭政治思想研究状况的整理，这里主要察看卢梭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论转向的实质。

第二章从政治秩序角度考察卢梭之前的舆论的气候的发育。本章分三节，第一节考察古典时期（农业社会）政治秩序思想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古罗马的西塞罗等关于政治秩序的思考。这些思想家提出的关于政治秩序的许多观点奠定了后来整个西方思想界讨论该问题的方向，其中许多思想为卢梭所借鉴，并在他的著作中有明显的体现；第二节，主要梳理西方现代政治秩序的兴起，也即广义的商业社会秩序的兴起取代古典秩序的过程，侧重考察了商人阶级如何利用欧洲的政治形势，利用基督教会和王权的矛盾并根据情势依违离合壮大自己的力量。笔者认为，体现在政治实践中，法律至上观念与个人

主义观念的结合和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是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其中基督教会势力的消减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但基督教会为这一新秩序的确立作了巨大的贡献；第三节，考察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对思想家思考政治秩序路向的影响，其中理性至上观念的确立对基督教会权威地位的消减起了推动作用，而对个人主观权利的重视是对个人主义的回应，科学主义的兴起则使公民问题变成在现代性前提下讨论政治秩序的主要问题，霍布斯、洛克等的思想都鲜明地反映了对新秩序的承认和赞赏。这些梳理展示出在卢梭的著作中曾经提及、但是没有展开的诸多思想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卢梭不必一一予以强调，但不妨碍这些思想在卢梭著作中的重要地位。本章的目标是要说明卢梭何以能提出他所关心的问题的解决思路。第三章，笔者先讨论了法国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以及巴黎的社会风尚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群体的活动模式。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目标是说明卢梭为什么要提出公民问题以及他的论证体系，接着依照卢梭著作文本的对卢梭公民观进行评注式解读，这些章节按“公民问题的提出”、“勾勒人类历史”、“公民生活的合法秩序”、“公民的培养”、“公民的生活方式”等内容排列，结语讨论了现代性问题以及卢梭和现代性的关系。笔者的主要观点是：卢梭的公民观是抗拒现代性的尝试，但是他的抗拒却推动了现代性的深入发展。

上部：“舆论的气候”与卢梭研究

第一章 卢梭研究的方法论讨论 及本书的考察框架

第一节 研究政治思想家的方法论思考

一、研究政治思想家的意义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对政治思想家的思想诠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这不仅因为思想家经常能敏锐地觉察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和病症，而且往往也会提出自己的纠治方案，不管这些方案是否有机会付诸实施——事实上，一个时代不可能只有一位思想家的智慧在发挥作用，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它们都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倘若仅止于此，那么思想家的重要性对后来人而言，也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娱乐，或者在最严肃的层面上，是出于增长知识的乐趣，即为知识而知识。在历史和现实中，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以研究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作为终身职业的学者难以胜数，我们若不往低俗的层面想，这些研究者不钟情于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应用研究，而着力于此，自有其合理性。

笔者认为，大思想家们的思想不止于他们看到了他们所处时代问题的症结，而且他们更看出了属于人作为人的存在所共有的症结。相应的，他们提出的纠治方案，也就不只是可以为他们的时代所吸纳，更可以镜鉴后人。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新的变化，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和群体的聚集总有不变的基本需要；另外，即便是社会有革命性的变迁，其结构的演化也不会是无序的，而且随着革命的结束，社会秩序的恢复，许多属于刚过去的社会的基

本属性仍然会发生缓慢而持久的影响。^① 对政治思想家来说，他们的学说具有长久魅力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仅触及基本的人性，还关注人类社会对秩序的基本需求。^② 他们学说中属于操作层面的部分或许会失去光泽，但学说的基本精神，却完全可能历久弥新，给后人以永久的启迪。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在现代社会，我们主要通过他们的著述去了解。在把传统理解为时间的线性延续的意义上，冈纳尔认为：“所谓的传统的政治理论著作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非传统性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些著作不但富有创新精神，而且与政治共同体也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脱离了政治共同体。”^③ “某些经典著作是创造性的心灵与政治秩序中的问题碰撞的典型结果。就其内容和产生的环境来说，它们带有相似性，具有某些共同的主题，这些相似之处使它们有理由组成一个政治理论和政治理论家的范例。许多著作不同程度地归属于它。”^④

不仅如此，政治思想家们的价值往往更多的是依靠后人的重新发现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家作为各自时代的先知，其角色主要的是社会的观察者，而未必是当事人。他们也许针对时代提出过救治方案，但不少人是相当清醒的，他们并不——甚至拒绝——认为他们找到了唯一的药方。更确切地说，真正的思想家很少会轻率地相信他所生存的社会里存在着有资格履行他所提出的方案的合格行动者。因此，笔者认为，对政治思想家，尤其是那些作为单纯的时代观察者的思想家，不必为他们时代的悲剧承担责任，更不必为在他之后的时代所发生的政治灾难——特别是那些建立在对他的精神错误领会的基础上的悲剧——背负骂名。下面的事实经常在历史场景中出现：“理论家和他带来的信息常常遭到社会的排斥……用卢梭的话说，理论家把自己的事业看做是‘与当今人们最崇拜的一切的对抗’，他期待的‘不过是对我普遍不满的怒吼’。只有在回顾往事的时候，他的洞察力的意义才明显地显现出来。”^⑤ 虽然思想家们的精神，经过一定时段之后，或许会通过一定的渠道渗入政治行动的范畴，从而改变人们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但理论

① 伯尔曼认为，革命一词适用于欧洲历史上的伟大革命时有四种主要特征，即革命的总体性、革命的迅速性、革命的暴力性和革命的持续性。参哈罗德·J. 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第11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关于革命的第四个特征，即革命的持续性，他说：“它持续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间，直到创始者自己的孙辈承认忠诚于他们祖辈的事业为止，在这期间，面对与革命初期的乌托邦理论的必要妥协，革命的基本原则获得重新确认和重构。”笔者认为，这一论述对革命而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而不只适用于欧洲。政治斗争的精义不是一条道路走到头，而应包含必要的妥协，这应当是政治学的常识。

② 沃林认为，长久看来，“人类生存不能依赖于低层次的小联合体，生活在面临无数毁灭的可能性的时代，人类生存的命运将由政治秩序决定”。Sheldon. s. wolin, *politics and v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0, PP434.

③ J. 冈纳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王小山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④ J. 冈纳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第137页。

⑤ J. 冈纳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第155页。

和实际状况之间的联系应该是不明显的。政治思想家若不是单纯出于一己之私的利益，也不是为某个具体的行动出谋划策，就没有为后人承担责任的义务。政治理论无论多么完美，那也只是有局限的理想，葡萄牙谚语说，“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愿筑成的”，它并不具备充分实践的根基。^① 由于现实生活中众多欲望无法充分得到满足，文明社会里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思考生存意义的一项重大内容。政治思想家们只是利用他们超人的智慧，构造尽可能完备的理论体系，向人们展示最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好生活的图景，以及或许可行的实践路径。这些学说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是由于它们更具有代表性和完备性，通过它们人们可以看清更明确的值得努力的目标。人们要得到的是通过个体和社会的努力去逼近美好的生活，而不是抽空这些诉求去实现一个理论。这应该是相当简明的道理。

然而，现代社会的不幸，就在于人经常在通向目标的过程中为手段所遮蔽。西美尔认为，这是所有较高程度的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他说：“这种文明的本质在于：与原始的社会关系不同，人类的愿望不再是简单的、近在眼前的、用直接行动能够实现的愿望，而是逐渐变得如此困难、复杂和遥远，以至于它们需要对手段和设备进行多环节的建设，在做准备步骤时进行多层次的迂回。”由于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因而需要许多的手段来实现人们的目标，但是“这种手段的获得本来就经常难以一下子实现，而是还需要许多手段，这些手段彼此相互支撑，最终汇集为最后的目标。但是，越这样就越容易导致这样的危险：陷身于这些手段的迷宫中并由此遗忘了最终目标”^②。政治思想家的学说，对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群来说，是能起到某种手段的作用。作为实践者，人们本来对此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如果把手段当目的去执行，由此若造成不幸后果，应该反思的是自己和相关的人群，而不是思想的创造者，因为思想家自身并没有被遮蔽。

因为人们容易自己迷惑自己，这决定了对政治思想家的研究就有了现实的意义。即我们需要结合自己时代的变迁所产生的问题，不停地从卓越的思想家那里去寻求智慧的启迪。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家的精神气质，经常是综合前人智慧的结晶，加上对自己时代问题的非凡思索养成的。他们的著作给后人提供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于他们综合思考的方式、方法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精神关怀，而不在于所提供的现成的技术性操作方案——实际上，普适不变的技术构建方案的现成答案永远不会存在。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前进一步：研究政治思想家，应该如何作？笔者认为，虽然不可能有一律的答案，但是提出一些基本看法却应该是可能而且必要的。

^① 冈纳尔认为，“政治理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缺乏成功的根基，在它的时代尤其是这样。”说明政治学理论也能印证这个生活的常识。见 J. 冈纳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第 155 页。

^② 见西美尔著，刘小枫编，《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内的文章《现代文化中的金钱》，学林出版社，2000 年版。

二、研究政治思想家应该注意的基本问题

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可能有多方面的才具，但如果他集中地谈论政治问题，应该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若只具有零星的火花，那么其人不足以定义为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不管是逻辑严谨、理智控制能力极强的著述者，或是情感充沛的鼓动者，都应该具有这一特征。即使其流传的著作中有很大的风格变化，那也应该是可以解释的——即便我们不必为了寻求一个统一的有完整思想的人而去注经式地牵强附会，也能够显示这个特色。比如，一个人前后期著作的写作风格出现了差异，或者论述的重点出现了转移，从最简明的角度思考，这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样貌，但这个人总有相对稳定的方面，他的变化也许正展示其之成长、进步，而这肯定是可以解释的；再有一些思想家，因其丰沛的情感充溢于其写作过程，因此其著作中的文字表达可能在表象中会出现前后矛盾，但如果我们只在这方面纠缠，可能会买椟还珠，失落了研究目标。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研究一位思想家，以一种同情的姿态进入是必须的。同情地进入作者的文本，不仅对研究是必须的，而且是对读书的一个基本要求。20世纪40年代钱穆在一次以“我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为题的讲演中就提到，“读一书，先要信任它，不要预存怀疑，若有问题，读久了自然可发现，加以比较研究；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便不能学。最后主要一点，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①。这不单纯是个人读书经验，而是能不能或适不适合读书的问题，如果连书都不会读，那就遑论研究了。同情地进入，是一种平静的辨析求知心态，并不是要求因此就爱上它，这是另一个极端，显然也是应当注意的。

笔者已经提到不少重要思想家著作中存在着“矛盾”的问题。它是不是真矛盾呢？笔者认为下结论之前，最好考虑一个思想家成长的过程，最笨的办法就是考察思想家的阅读经历，除此以外还要注意思想家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这就连带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在横向上，研究者应该注意被研究者的社会关系的小环境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的大背景，对后者，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是套不住的；另外，还有一个纵向的历史师承问题，这不是简单地要求考察其求学的师承，而是要对他的时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学术以及历史氛围中，思想家是不是受制于或是突破了这个氛围，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或是判断。这不仅要求我们留意思想家们前面的时代，还要求我们注意稍后于其时代的社会和历史状况。若是能较为全面地考虑到这些问题，大部分矛盾应该是能够得到较好解释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研究一位思想家，不管从哪一方面着手，都应该注意其思想的完整性。片段总是整体的一部分，如果热衷于读了片段，就推论一位思想家的精

^① 严耕望，《治史三书》之《从师问学六十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神实质，恐怕会厚诬前贤，贻误后学。钱穆曾说：“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可随便乱读”。^① 作为研究者，即便我们不能达到那么高的悬格，但下点死工夫，做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应该是基本的研究态度。

研究政治思想史，虽不至于像研究学术史那样必须要精细地钩沉稽玄，但不相当完整地解读文本，却更容易流于玄想——远远偏离思想家的真实，变成研究者的真实。桑兵认为，研究学术史的求真有二，一是所评学案的真，一是学者心路的真。^② 我们暂时不管第一条，第二条与思想史研究却是相通的。他说：“追求事实真相，必须掌握各自的心理。其主要途径，并非借助心理学理论，而是了解相关人事的复杂关系，明了各人态度立场有别的原由，在此基础上，形成综合印象。”“求学案之真虽为研究的目的，求学者心路之真更为重要。欲达此了解同情的境地，须追踪事情发展的客观过程，不以牺牲事实真相为代价去寻求规律，更不能削足适履地迎合模式。”^③ 这里的重点是讲摸清思想者站在什么时代、什么位置上，主要说了什么，以及其思想的承前继后的演化。我们若不学习研究学术史的基本方法，只能是各执一词，千人千见，思想家就面目模糊了，其思想就成了残金碎玉，这就失去了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根本意义。

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关键是它为现实提供了一个可观照的坐标。有学者认为：“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为了要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④ 对政治思想家的研究服从现实需要的特征应该更加明显。由于对思想家的研究，最终还得对其思想进行诠释，因此如何解释才不会大幅度地偏离思想家的本来意义——完全符合思想家自身想法的解释在我们看来是不存在的，但不过分违背却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即便我们的研究是为了现实服务，但学术的严肃性应当是优先得到考虑的。这样，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看法——“文本一旦出版，作者自己就死亡了”——在本考察中得不到任何支持。笔者认为，依据作者自己提供的表达自己看法的可靠材料来发现其对我们的启示是第一位的，相对于读者，作者本身的看法更重要。言而有据，对研究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来说，和其他史学研究一样，是格外重要的。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所有对前人的研究，我们的最大优势其实是因为我们是

① 严耕望，《治史三书》之《从师问学六十年》。

② 桑兵，《国学与汉学》，绪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桑兵，《国学与汉学》，绪论。

④ 张荫麟，《中国史纲》之“自序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事后诸葛。这个意思是，我们研究过去的人或事，通常是站在一个立体的视野来看问题的。如果是历史当事人，通常只能是平面的；但对思想家来说，他们的价值却恰恰在于，相对于自己的前人，他们也是有一个立体视野的。他们的文本通常着眼甚大，有一个宏大的关怀。当我们进入他们文本的世界时，是把思想家的著作当作平面的还是当作其本身是立体的视界来看待，这就可能决定我们研究的可靠性问题。

笔者的这些看法主要得自曼海姆的启示，他认为研究思想史首先要确定问题的“位系”，“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现存潮流和趋势的概要，而且还需要一种最基本的对于特定时期提出的问题的结构分析，该分析不仅要告诉局外人研究的内容，而且要指出文化科学家在工作过程中面临的终极选择，以及他的生存环境中的压力，这种压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他的思考”^①。他的意思是研究思想史应该注意历史学—社会学的视野。笔者将努力按照这个启发展开本课题的考察。

第二节 本书的选题进路

本书的写作源于对“西学东渐”问题的关注：近代中国存在历史和社会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西方的介入，不管其后果的好坏，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这其中，西方政治思想传入中国，对中国晚清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随之，由于他们的鼓吹，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又形成了辐射作用，并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切实的影响；然而，近代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像样的现代宪政国家。现代宪政国家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共享的成果，尽管其形式有诸多不同，但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以及达到这两点的一系列相关制度却共享一种精神实质，表现在政治层面，粗略地说，就是所谓的民主政体。民主宪政思想在晚清传入中国，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曾对西方民主政体的建立，作过深刻的理论探讨，并且在运作层面留下了鲜明的烙印。但这些实践并没有产生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成果，这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

这个问题构成了本课题的起点。要考察这个问题，对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重新检查近代中国思想家们传播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是怎样理解西方的政治思想的？又是怎样传播，或者说传播了些什么？到了这一步，笔者发现研究问题的视野就开阔起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西方思想家到

^① 见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之《知识社会学问题》，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位系”一词乃曼海姆借自星象学的术语，其意思也参该文。